

高教动态

中央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2018 年第 4 期（总第 294 期）

目 录

- 一、上海财经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公布
- 二、上财牵头协同复旦、交大共建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
- 三、大学不能被排行榜“绑”着走
- 四、世界顶尖商学院院长：2018 年 AI 对商学院的影响
- 五、中美两国前十大大学对比

一、上海财经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公布

上海财经大学1月29日正式公布《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方案》指出，上海财经大学聚焦“经济学与商学”学科群建设，涵盖统计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四个一级学科，未来将加快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引领并带动学校学科水平的整体提升。

学校紧密结合优势与特色，经过校内外专家论证、学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最终确认以“经济学与商学”学科群为建设口径，统计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四个一级学科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是学科要素在理论基础、实践应用和方法手段的统一，同时“经济学与商学”也是国际公认的学科口径。

《方案》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学科为基础，以改革为动力，立足学校实际，广泛凝聚共识。提出以富民强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为价值追求，持续提升学科水平，2020年跻身世界一流学科行列，2030年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一流学科，基本建成国际知名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通过“经济学与商学”的重点建设，上海财经大学加快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引领并带动学校学科水平的整体提升。建设内容包括：探索具有上财特色的德育教育模式，深化本科生“3*3”培养和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改革，面向国家急需和学科交叉，培养一流人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瞄准学科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跨学科联合研究，强化大数据科学实验室等实验中心的支撑作用，深化科研评价机制改革，产出一流科研成果；以高水平智库、重大服务项目、原创数据库为依托，推进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一流社会服务；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中国商学文化，凝练具有鲜明特色的上财文化，推动一流文化传承；加大一流人才引进力度，完善“常任轨”制度，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创新博士后工作机制，汇聚一流

师资队伍；成立国际咨询委员会，积极参与国际评估与认证，积极培育国际高端合作项目，打造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开拓一流国际交流合作。

来源：上海教育新闻网 2018 年 1 月 30 日

二、上财牵头协同复旦、交大共建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

1 月 6 日下午，由我校牵头、协同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共建的“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在校行政大楼正式揭牌，并举行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蒋传海发表讲话。他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快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科技创新、现代金融是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正值加快推进“四个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时期，需要有与上海地位相匹配的应用经济学学科作为支撑，需要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性地提供富有洞察力的学术新知和政策建议。应用经济学是上海市目前启动建设的 IV 类高峰学科中唯一的人文社会学科，我校携手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共建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通过同城协同，汇聚优质资源，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打造国际一流、国内顶尖的高水平学术机构和高端智库，推动上海应用经济学整体学科水平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他表示，学校一定全力支持研究院建设，希望研究院主动对标世界一流标准，提升国际影响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撑，并积极探索同城协同、改革创新运行机制，有效释放人才、资源等学科创新要素的活力。

在国家“双一流”建设和上海“四个中心”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的背景下，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根据《上海高等学校学科发展与优化布局规划（2014-2020 年）》及规划实施方案启动 IV 类高峰学科建设。应用经济学 IV 类高峰学科是目前启动的唯一人文社会学科，由上海财经大学牵头，协同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共同建设，经两年筹备成立“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院秉承“立足上海、放眼世界、献策中国”的理念，汇

聚一流人才，产出一流科研成果，提供一流智库服务，建设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金融与经济大数据实验室，探索先进的协同创新机制，积极为国家与地方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来源：摘自上海财经大学新闻中心 2018 年 1 月 6 日

三、大学不能被排行榜“绑”着走

几乎每位大学校长都不同程度地被裹挟进一种“成长的烦恼”——大学排行榜。一份份角度各异、形式不同的榜单，让不少高校几多欢喜几多愁。在今年全国两会中，校长们也对这一“烦恼”一吐为快。

“大学排行榜对校长而言，是一种外部压力，要关注但是不能被绑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并不否认，目前传播较广的大学排行榜大多注重国际顶级期刊论文、各级各类科研基金、申报国家成果奖和各种人才称号等。而在这些指标上的表现，确实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校科研水平。

“但是有一种论文并没有纳入这些大学排行榜，那就是写在中国大地上的论文。”丁烈云表示，高校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未反映在这些排行榜中。但能说这种扎根中国大地的“论文”不重要吗？扎扎实实做好高校科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接，用知识产出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是高校重要的使命和功能之一。

“大学校长不在乎排名，那是假话。但要是照单干，那是没出息。”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校长赵继在之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大学排行榜用相对简便快捷的指标去衡量大学的办学水平，其目标指向不应该是为大学排出三六九等，而是帮助大学找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大学校长要有定力，而且从长远来看，也要有自己的评价体系。”

若以工具论，那么大学排行榜这个工具好用吗？

“各类大学排行榜像是‘盲人摸象。’”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解释说，“摸到象腿上有有个很大的瘤，就认为有问题。

然而，一个‘瘤’显然不代表整个大象的问题，没有摸出‘瘤’也不代表没问题。”

吕建坦言，对于大学排行榜，要从两面看。评价指标中折射出的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如果确实存在，就要去改正、解决。对于赞誉，也要去看，是否是真的好。“无论怎样，南京大学内涵式发展的办学理念、办学方向、发展道路是不会因这些而改变的。”吕建说。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农学院院长邢克智特别关注一个数据，当时全国有近 20 家机构以不同的指标体系做出了约 100 个大学排行榜，排行的内容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当时有评论说，不怕排行榜“风”大，就怕高校“墙头草”。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过了掰着指头数论文的时代了。”曾在浙江大学工作过的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回忆起，1998 年浙江大学四校合并初期，年均发表 SCI 论文总数仅有 300 篇，当时全国年均发表 SCI 论文数量最多的高校也是在三位数徘徊。而如今，浙江大学年均发表 SCI 论文数量已经数以千计。“我们的高等教育要建立自信。”沈满洪说。

丁烈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以 R & D 经费占世界份额比例为例，2000 年中国的 R & D 经费在世界份额中占比只有 1.7%，而 2014 年这个比例达到 14.4%，仅次于美国。在发表学术论文方面，中国高校发表数量和被引用率名列世界前茅。”丁烈云说。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8 年 3 月 8 日

四、世界顶尖商学院院长：2018 年 AI 对商学院的影响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院长弗朗西斯科·维罗索（Francisco Veloso）表示：“数字和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所以我希望在 2018 年看到更多学校关注这些领域。”

“随着企业转型以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学校需要做更多事情，为学生提供工作所需的工具，以开展区块链、金融科技、众筹或社会创新等领域的业务。”

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院长比尔·博尔丁（Bill Boulding）表示，商学院也将更加重视科技创新背后的伦理。

他说：“我们不能失去技术进步中的人为因素，否则我们就有失去固定生活价值的风险。例如，我们的学生需要认真思考基于规则的算法与人类判断之间的平衡。”

在过去的一年中，几所顶尖学校在他们的 MBA 学生中开设了选修课，这些课程正在探索人工智能的影响，其中包括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

咨询公司普华永道（PwC）表示，尽管手工劳动最容易被自动化所驱逐，但白领的角色越来越被数字化——从律师到股票交易员。

人工智能正在进入 MBA 就业市场，像 IBM 这样的雇主使用机器人招聘者筛选候选人。公司也在寻找能够跨越服务线管理算法的管理者，并利用数据更好地做出业务决策。

乔治城大学麦当劳商学院院长保罗·阿尔梅达（Paul Almeida）说：“雇主将会更快地采用数字化筛选程序来扩大他们的影响范围，聘请最优秀的人选。”

他补充说：“商学院将提供更多的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方面的选修课程，全部使用新的在线平台，而这也会成为标准做法。”

人工智能也会改变学生在线学习的方式。学习和改进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反馈。今天，学生们收到了来自教师和同学的有限反馈。不久之后，西班牙 IE 商学院院长马丁·博姆（Martin Boehm）表示，这种反馈可以通过自动化更容易地获得。

他补充说：“这将使学生在每次课后都能获得有价值的反馈。”

来源：搜狐教育 2018 年 1 月 18 日

五、中美两国前十大大学对比

1、同样搞科研，创新机制截然不同？

我们 300 多位教授捆绑在十七、八个研究所里，具体的科研基本上也就是这十七、八个单位来做。而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机械系，教授、副教授、助教加起来总共 60 位，但他们却有 60 个创新团队，再经过排列组合后，可能会出现创新小组超过 100 个。

从创新机制来看，中美大学间的区别非常大。中国的大学基本以国家战略目标为导向。比如，国家现在有 16 个重大科研专项，很多科研经费也就顺着这些项目拨过去了。而在美国，大部分的创新还是以个人兴趣为导向。这样，从资源分配来看，中国的科研经费实行的是国家拨款，且拨款方式比较集中。16 个重大专项，每个都是上百亿资金投入。而美国实行的则是分散性投资。

再从组织结构方面看，中美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别。在科研上，中国的高校一般是大团队、大梯队，而美国都是小梯队、小组，但这些小组又可以动态组合成无数个新的队伍。

必须注意的是，以创新兴趣为驱动的知识创造，其结果不一定马上就能应用，一般来说，重大科研突破都属于这种情况。因此，就未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来说，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创新环境，二是创新机制，三是创新基础。

首先，中国的创新环境基本上是对接国家需求的。

第二，在创新机制上，中国大学要学会在科研大团队模式和动态协作的众多科研小组模式上实行两者兼顾，既不能完全依靠大梯队，也不能像美国，都靠个人小组。

第三，从创新基础来说，未来 10 年，中国大学很可能要经历一个大的变革。

2、缺淘汰制度，博士生质量“差太多”？

在中国，一旦进入博士班，几乎没有什么淘汰机制能把不合格的学生淘汰掉。但在美国，大学的答辩委员会认为，如果给一个不合格的学生博士学位，让他毕业，就等于把学校品牌给他了。所以他们非常慎重，宁缺毋滥。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创新人才。不言而喻，如果大学教育体系跟不上，就会直接影响到人才的培养。

3、课程改不改，到底谁能说了算？

在知识爆炸的社会里，很多新知识大家都希望学，但是学时有限，怎么办？美国大学每几年就要进行一次教学改革，不断地变革。任何的改革不是平白无故、没有依据地改，而是要根据调研资料反映出来的问题来改。

美国大学的教学改革怎么进行？首先，要在改革前做调查，任何的改革不是平白无故、没有依据地改，而是要根据调研资料反映出来的问题来改。

4、教授提得快，导致人才“变了样”？

在评价上，现在国内评价教授的标准是，以中国自己定义的标准评价，即我们说这个人是大教授，他就是大教授。而美国对教授的评价，依据的是国际公认的标准，即在学术地位、教学、科研等方面有自己的贡献。

就目前来讲，中国高校师资队伍普遍比美国前十位大学的要差。国内大学聘用教师的标准太随意，太低，有时提拔教授很快，但并不强调个人的创新。这些年，很多高校都从海外引进教师人才，但一些学校却没有把人才用好，导致引进人才过了一到两年就本土化了。

再看**课堂文化**，中国高校的办学理念和美国也有明显差异。国内大学以传授书本知识为主，而美国大学在培养人的能力、创新性和传授知识上是三者兼顾的。

在**教学方法**上，中国的教学一般是教授在课堂上讲，学生听讲、记笔记。但美国大部分的老师都是一边教授知识，一边与学生互相学习，这也是美国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强于中国学生的重要原因。

作者：倪军，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院长，中国首批“千人计划”学者，入选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摘编自里瑟琦科教观察 2018年2月3日